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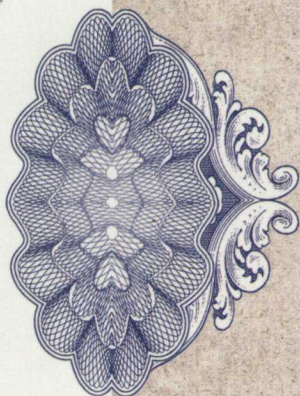
〔美〕蒲嘉锡 (Noel H. Pugh)
赵真华 陈佳琪 译

同床异梦

中华懋业银行的历史

(1919—1937)

Same Bed, Different Dreams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American Bank of Commerce,
1919-1937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博
雅
史
学
论
丛

海
外
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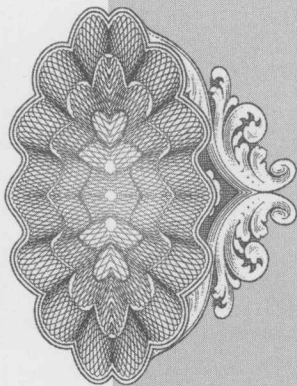
究

014040728

F832.9
36

雅
史
学
论
丛

海
外
中
国
史
研
究



同床异梦

中华懋业银行的历史
(1919—1937)

〔美〕蒲嘉锡 (Noel H. Pugh)
赵真华 陈佳琪 译 著



北航

C1728179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F832.9
36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4-136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同床异梦:中华懋业银行的历史:1919—1937/(美)蒲嘉锡(Pugach, N. H.)著;赵真华,陈佳琪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4
(海外中国史研究)
ISBN 978-7-301-23880-6

I. ①同… II. ①蒲…②赵…③陈… III. ①中华懋业银行-银行史-研究-中国-1919—1937 IV. ①F83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20510 号

Same Bed, Different Dreams: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American Bank of Commerce, 1919-1937 by Noel H. Pugach

Copyright © 1997 by the University of Hongkong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4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同床异梦——中华懋业银行的历史(1919—1937)

著作责任者: [美]蒲嘉锡(Pugach, N. H.) 著 赵真华 陈佳琪 译

责任编辑: 张 晗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3880-6/K · 1023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pkuwsz@126.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67315

印 刷 者: 三河市博文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965 毫米×1300 毫米 16 开本 17.5 印张 252 千字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以感激和爱献给希拉、迈克尔和劳拉

前 言

197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作了一个清醒的决定,向世界敞开国门。为了加速经济发展、获得现代科学技术,他们审慎地鼓励建立中美合资企业。到1990年为止,由于受到中国发展潜力的吸引和中国官员的推动,在中国,特别是在由北京政府建立的经济特区,建立了几千家中美合资公司。然而,其中许多马失前蹄,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毕竟对于双方来说,这都是前所未有的经历,而且他们显而易见缺少有意义、有价值的路标来指引。事实上,简略回顾1949年以前中外合资企业的历史会很有帮助。

历史无法提供确切的结论,也不能预言特定的结果,当环境不同时尤其如此。然而历史却确实确实为我们提供见识和眼光。人、机构和民族如何行事是有基本规律的,在定义和寻求自己的利益时也存在某种相似之处。

中华懋业银行是早期少数几个有大量文件保存下来的中外合资企业之一。在下面的研究中,我力求竭尽现存文件材料之可能来演绎它的历史,并且对中方和美方的目的和遭遇的难以计数的问题进行分析。无论在何处,只要相关,我就会把中美合资公司置于20世纪第一个十年到30年代中美关系这个更大的语境之中。中华懋业银行对于理解这一时期中美经济关系这个更大的议题至关重要。它也会为近年来的中美合资公司的尝试提供一个实实在在的广泛的视野。

这本书的标题“Same Bed, Different Dreams”来自中国的成语“同床异梦”。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个标题恰如其分地描述了中华懋业银行乱事频仍的历史,也描述了20世纪70年代末雨后春笋般在中国出现的许许多多合资公司的经历。的确,我曾在孟捷慕(Jim Mann)对北京吉普汽车公

司历史的杰出重建中见过这种表述,而这家公司是由美国汽车公司——现在称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参与的合资公司的“典范”,它的合资伙伴是北京汽车制造厂。

然而,我的兴趣——就总体而言,是中美合资企业;就个体而言,是中华懋业银行——早于近年来的这些现象。在20世纪70年代初,我一直在研究20世纪初几次建立这种合作模式的尝试。我在研究芮恩施(Paul Samuel Reinsch)公使生平的过程中,才对中华懋业银行的建立有所了解。直到沉浸于詹姆斯·A. 唐默思(James Augustus Thomas)——银行的第一任美方协理——的大量文件材料中,我才觉得有可能撰写出银行的全部历史。甚至那时,我也怀疑我是否能完成这个项目,因为还存在着诸多空白。多年以后,我从其他不同的渠道积累了许多额外的资料,有些资料是偶然得到的,直到此时,我才觉得可以就该合资企业的一些基本问题发表意见。这个银行是怎样,又是为什么建立起来的?它是一家怎样的金融机构,它又是怎样融入中外银行系统后运营起来的?它是怎样经营的?中国和美国合伙人把他们大相径庭的商业观念和文化观念带入了公司,他们又是如何共事的?双方各自的政府发挥了怎样的作用?银行遇到了怎样的问题,而银行的领导者又是如何应对的?而且当然,银行最后的命运如何,又怎样去解释它呢?

这一研究的某些部分较早的版本曾出现在《商业史评论》(*Business History Review*)、《太平洋历史评论》,还有布里西亚·罗伯茨(Priscilla Roberts)编写的《1900年以来的中美关系》(*Sino-American Historical Relations Since 1900*, 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1991)的论文和杂文中。在此感谢出版商允许我使用这些资料。

我有幸在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与一个精明强干而又高效的员工团队共事。我要特别地感谢黄绍伦(S. L. Wong)教授的主任助理古诺尔·克里帕兰尼—撒丹尼女士(Coonor Kripalani-Thadani)。

在我研究和写作的过程中,积累下无数人情债,这些人慷慨地奉献了他们的时间、精力和学识,向我提供了宝贵的帮助和建议。我感谢多年以来在这一过程中曾拜访过的图书馆和档案馆的员工,特别是在杜克大学

赫伯特·胡佛总统图书馆,斯坦福大学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国家档案馆,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贝克尔图书馆,威斯康星州历史学会工作的员工。新墨西哥大学吉默尔曼图书馆馆际部一直提供礼貌而高效的服务。新墨西哥大学科研拨款委员会为我提供了几笔旅行津贴,使我可以去上述机构从事研究工作。我对它的支持深表感谢。

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学生罗志田博士(他在新墨西哥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还有叶林先生(他正在新墨西哥大学完成博士学位),本研究的汉语资料由他们发掘并译出。罗志田博士阅读了全文书稿,向我表达了他对于20世纪20年代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个人见解。受新墨西哥大学资助的几位研究助理在查找和抄写资料方面给了我宝贵的帮助。

我非常感谢埃莉诺·唐默思·埃利奥特(Eleanor Thomas Elliot),詹姆斯·A.唐默思的女儿。埃利奥特女士向我提供了一些她父亲个人的回忆录,给我介绍了英美烟草公司的几位官员,还给我提供了许多其他人的名字,她觉得这些人可以在研究中为我提供帮助。她一直鼓励我的工作,多年以来,她和她丈夫约翰已经成了我的朋友。帕特利西亚·钱(顾菊珍)也同样提供了帮助和建议。我们的关系始于对她的父亲,顾维钧阁下的生平、活动、交往的共同的学术与智识兴趣,这种关系现在已发展为我们的个人友谊。我也同样感谢帕特里克·希伊(Patrick Sheehy)、大卫·B.斯通(David B. Stone)和弗雷德里克·E.哈格(Frederick E. Haage),他们不辞辛劳帮我搜寻研究所需的资料。

在完成这一研究的过程中,我的挚友和同事构成的大圈子给我建议、见解和鼓舞。我可以列出几位。这些人中有已故的霍华德·舍恩伯格(Howard Schonberger)和景复朗(Frank H. H. King)博士,他们与我分享关于东亚银行方面的渊博学识。还有我在新墨西哥大学的同事和朋友们,乔纳森·波特(Jonathan Porter)、霍华德·拉比诺维茨(Howard Rabinowitz)、玛格丽特·康奈尔—萨斯(Margaret Connell-Szasz)和弗兰克·萨斯(Frank Szasz)。弗兰克·萨斯阅读并编辑了全部书稿;他在我的最后一稿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修改,使我免于犯下文体和语法的错误。我对

他特别地感激。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希拉(Shelia),还有我的一双儿女迈克尔和劳拉,他们多年以来一直坚定不移地在精神上支持我,始终如一地鼓励我。谨以此书,献给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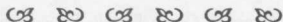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构想之初	
——酝酿中的中美合资银行	1
第二章 机遇之门	
——中华懋业银行的建立	25
第三章 联袂之作	
——唐默思与徐恩元共建的银行	56
第四章 困难重重	
——懋业银行堆积如山的问题	87
第五章 何去何从	
——十字路口的合资公司	122
第六章 峰回路转	
——中国化与时局的好转	155
第七章 土崩瓦解	
——中国化的另一面	182
第八章 穷途末路	
——中华懋业银行的末日	208
第九章 盖棺定论	241
附 录	252
参考文献和资料来源说明	258

第一章 构想之初

——酝酿中的中美合资银行

从许多方面来讲,这都是一件让中国人颇感意外而且非比寻常的大事。在此前的两周时间里,中美双方的投资者本着完全平等的原则,最后敲定了建立第一家真正的美中合资银行的全部细节问题。空气里弥漫着无限的期待和欢欣鼓舞,中国经济发展和中美合作关系的新时代即将破晓而至。1919年12月11日下午,在中国前国务总理钱能训北京的家中,三位美国商界巨头和中方的投资者欢聚一堂,他们有些人西装革履,有些则一袭长袍马褂,参加这个新建立的金融机构的第一届股东大会,而中华懋业银行的问世已为时不远了。^①



创办中美合资银行的构想一直可以追溯到19世纪80年代,而真正付诸行动则始于1910年。尽管中美双方的倡导者们付出了近十年的努力,其间遇到了难以计数的困难,但是他们始终没有放弃建立中美合资银行的想法。他们最终之所以能如愿以偿,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一些更大力量的偶然聚合,以及中美两国经济在某些领域所取得的进展。这主要包括:中国经济发展中现代部门的出现,新式银行的日益普遍;外国在华企业以及中外合资企业中,中方投资者投资经验的不断积累;中方有些人难以捉摸的愿与美方进行经济合作的欲望;以及美国商界对中国市

① “Minutes of a Meeting of the Shareholders of the Commercial & Industrial Bank of China,” Dec. 11, 1919, Record Group 84 (Records of the Diplomatic and Consular Posts), file 851.6 (hereafter cited RG 84, with file number, year and volume), 1920, vol. 27, National Archives (NA), Washington, D. C.; Hollington K. Tong, “The New Chinese-American Industrial Bank,” *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 XI (Dec. 20, 1919), 105-10.

场的无限向往。^①

历史学家们一直在争论西方国家、西方的帝国主义或西方扩张对 19 世纪末期 20 世纪初期的中国的影响,这种影响的性质如何,意义如何,程度又如何。其中,中国现代化的失败以及经济发展的停滞与落后,是应该归因于外部因素(基本上是西方)的控制和压制,还是应该归咎于内因和内生性的问题,就是众多富有争议的问题之一。对此做出定论是不太可能的。但是,不管怎样,这样的争论已经为深入探索中外关系问题提供了宝贵的见解。^②

无法否认,在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已经存在一些现代生产部门,而西方资本主义对这些现代生产部门的发展进化至少起到了部分作用。西方为现代工业、商业和金融企业提供了资金、技术和企业范式。西方的特权和租界为中国商人和投资者们提供了一个避难所,使他们可以免受本国政府官员的掠夺和低效率的官僚机构的影响,同样,也可以逃避中国政局的不稳定和动乱;绝大多数中国人所拥有的工厂和

① Noel H. Pugach, "Keeping an Idea Aliv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ino-American Bank, 1910-1920,"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56 (Summer 1982), 266-93; Roy C. Bennett, "American Banks Taking Their Place in China," *China Weekly Review* (hereafter CWR), "Special Banking and Financial Issue," 25 (June 30, 1923), 10-12, 81.

② 费正清(John Fairbank)、费维凯(Albert Feuerwerker)、墨菲(Rhoads Murphy)、吉尔伯特·罗兹曼(Gilbert Roznan)和史景迁(Johnson Spencer)在他们的主要著作中都倾向于弱化外国影响的作用,而集中精力探讨本土因素在塑造中国经济中的作用。郝延平断定西方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既有正面的影响又有负面的影响。他没有贬低外国的影响,但更强调中国人自己的贡献,注意到中国商人意味深长的、对于在外国企业中获得股份的追求。与他有相近的中性立场的德怀特·帕金斯(Dwight Perkins)强调中国人具有适于发展现代经济的价值观念和性格特征。罗伯特·F. 德尔伯格(Robert F. Dernberger)和马克·埃尔文(Mark Elvin)认为外国的影响对中国的现代部门是一个大有裨益的因素。侯志明也倾向于上述观点,强调现代部门稳固不断的发展。柯博文(Parks M. Coble)和陈曾年把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失败归咎于中国政府,中国政府既依赖于那些具有潜力、生机勃勃的私人资本,又要对其完全掌控,使其在官僚主义的挥霍无度、效率低下和资本匮乏中艰难运营。考伯尔追溯了 20 世纪的前三十个年头里,由于中央政府摇摇欲坠,民族私人资本特别是上海的资本家们放开了手脚,其企业的发展迅猛而又富有朝气。结果到最后,他们却被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蚕食鲸吞,扼杀殆尽。托马斯·G. 罗斯基(Thomas G. Rawski)在他近期的修正主义研究中主张,在前共产主义时期,私人资本部分,而非政府部分,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引擎;中国传统经济在面向西方的入侵时并没有土崩瓦解,而是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而中国现代企业在外国公司的竞争中也能够一争高下。换句话说,其收获是硕果累累、共赢共生的中外关系。更全面的引述参阅第 4 页注释 1。

新式银行都设在上海、天津等地的租界。著名银行家陈光甫证实,当时的外国租界对中国新式银行和私人企业的整体发展都是有大有裨益的。^①最后还有,外国的侵入点燃了中国民众的爱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热情。到20世纪20年代,这引发了一场试图在后者的优势领域击败西方——后来逐渐是日本——竞争者以便掌握中国经济更大的自主权的运动。

实际上,在过去的30多年里,史学界一致用“双重经济”(dual economy)一词来描述中国经济。传统经济居于主导地位,影响了绝大多数百姓的生活。虽然传统经济受到了昏庸无能的政府决策、日益衰败的清朝统治、周期性的战争和动乱,以及根深蒂固的地方绅商的心态和成规的阻碍,但是,不管怎样,它依旧具有一定的生命力,养活了中国的几亿人口,并且成功抵御了外国对中国的全面渗透以及对中国国民经济的控制。

与对外贸易和早期工业化相关的现代部门主要局限在通商口岸和几个内陆中心城市,并且几乎都是独立运作的。虽然,西方列强以及后来的日本对这些地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获得了对中国对外贸易和关税收入的有效控制,但是,它们从来就没有完全居于主导地位,甚至也没有尝试要将中国人完全排斥在外。实际上,外国在华企业一直要依靠中国人,不仅要靠他们向内陆市场渗透,获取原材料,而且通商口岸的经济也依然离不开他们。在19世纪,外国企业离开买办,在中国根本就无法运作。从买办开始,中国人在外国企业中做代办、经纪人、合伙人或者投资者,为外国在华企业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19世纪末期官督商办企业的衰败及其部分私有化、科举制度的废除,尤其是相当数量的受过西方教育的留学人员归国,进一步促进了强有力的中产阶级内核的形成。20世纪头十年到20年代,在一些大城市和通商口岸,尤其是上海,中产阶级迅速兴起。这些商人、资本家和银行家借用了西方模式,坚持秉承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并依此行事。这些为数不多的中产阶级,加上一些知识分子以及少

^① “The Reminiscences of Ch'en Kuang-pu (K. P. Chen),” as told to Julie Lien-ying Han (December 6, 1960-June 5, 1961), 68, Columbia University Oral History Project, Columbia University Library, New York, NY.

数进步官绅,和外国在华企业既具有一定的共同利益,同时又是它们的竞争对手。

有大量证据表明,与印度和东南亚不同,中国从来就不具有“殖民地经济”的性质。费正清和其他人的研究表明,现代部门刚刚兴起的时候,中外势力是旗鼓相当的,通商口岸也可以看作是中外合作的结晶。显而易见,最为成功的外国在华企业,比如,英商怡和公司(Jardine, Matheson & Co.)、英美烟草公司(BAT)、美国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甚至更为财大气粗的汇丰银行(Hong Kong &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等,都适应了中国环境,并且和中国商界建立了密切联系。

因此,简单的依附理论,对前共产主义时代的中国并不适用。至少在经济领域,外国入侵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局限在一定的范围之内的。中国人相信他们有能力也有信心甄别西方的模式及其所带来的影响,他们并没有放弃本国经济的主导权。大量事实表明,他们在对外合作与竞争中,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当然,这并不能保障他们不犯严重的错误,或者不会屈从于根深蒂固的中国惯例。实际上,中华懋业银行的经历就从多方面、多角度支持了以上对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经济和中外关系所进行的描述。^①

① 此处的综合基于如下著作:David G. Brown, *Partnership with China: Sino-Foreign Joint Venture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Boulder & London, 1986); Parks M. Coble, Jr., *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1927-1937* (Cambridge, MA, 1980); Sherman Cochran, *Big Business in China: Sino-Foreign Rivalry in the Cigarette Industry 1890-1930* (Cambridge, MA, 1980); John K. Fairbank,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12, Republican China 1912-1949, Part I* (Cambridge, 1983); Fairbank,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 (New York, 1986), especially 94-99; 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 1842-1854*, vol. I (Cambridge, MA, 1953); Albert Feuerwerker, *China's Early Industrialization: Sheng Hsuan-Huai (1844-1916) and Mandarin Enterprise* (Cambridge, MA, 1958); Feuerwerker, *The Chinese Economy 1913-1949*, Michigan Papers on Chinese Studies, No. 1 (Ann Arbor, 1968); Yen-p'ing Hao, *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The Rise of Sino-Western Mercantile Capitalism* (Berkeley & Los Angeles, 1986); Hao, *The Comprador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Bridge Between East and West* (Cambridge, MA, 1970); Chi-ming Hou, *Foreig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1840-1937* (Cambridge, MA, 1965); Frank H. H. King, *The History of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II, *The Hongkong Bank in the Period of Imperialism and War 1895-1918* (Cambridge, England, 1988), especially 517-19; Edward LeFevour,

仿照美国和欧洲的商业银行模式,建立中国的新式银行,就是这种选择性和自觉性借鉴的最佳范例。19世纪中期,外国银行在中国沿海地区出现,并很快给传统钱庄票号的银行业务经营以致命打击。最初,外国银行只经营它们占据主导地位的外汇和外贸业务。很多外国银行也发行纸币,为通商口岸提供了可靠的货币,并成为中国货币流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随着列强在中国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中国背上了巨额的对外赔款,规模较大的外国银行开始向中央政府和一些地方政府提供贷款业务,并为大型投资项目,尤其是铁路和采矿业,提供资金。简言之,外国银行深入地渗透了中国日常的经济生活。

英国的银行捷足先登,汇丰银行(1864年在香港建立,次年在上海建立)逐渐成为外资银行机构中的佼佼者。德意志德华银行(Deutsch-Asiatische)、华俄道胜银行(后称俄亚道胜银行,Russo-Asiatic)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Banque de l'Indo-Chine)在东亚银行界也占有一席之地,并且在重要的商业中心都建立了分支机构;日本控制的金融机构横滨正金银行(Yokohama Specie),以及由台湾银行(Bank of Taiwan)、朝鲜银行(Bank of Chosen)和日本兴业银行(Industrial Bank of Japan)代表的财团于1914年

Western Enterprise in Late Ch'ing China: A Selective Survey of Jardine, Matheson & Company's Operations, 1842-1895 (Cambridge, MA, 1968); D. K. Lieu (Liu Ta-chun), *China's Industries and Finance: Being a Series of Studies in Chinese Industrial and Financial Questions* (Peking & Shanghai, 1927); Andrea Lee McElderry, *Shanghai Old-Style Banks (Ch'ien Chuang) 1800-1935* (Ann Arbor, 1976); Rhoads Murphey, *The Treaty Ports and China's Modernization: What Went Wrong?*, Michigan Papers in Chinese Studies, No. 7 (Ann Arbor, 1970); Dwight H. Perkins, ed., *China's Modern Econom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Stanford, 1975), especially the essays by Robert F. Dernberger and Mark Elvin; Thomas G. Rawski, *Economic Growth in Prewar China* (Berkeley, 1989); Gilbert Rozman, ed.,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New York, 1981); Jonathan Spence, *To Change China: Western Advisers in China 1620-1960* (Boston, 1969); Y. C. Wa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 1872-1940* (Chapel Hill, 1966); For a critical Chinese survey, see also Ch'eh Tseng-nien (T. N. Chen), "Mei-kuo yin-hang erh-shih shih-chi ch'u tsai Shang-hai ti k'uo-chan ho Shang-hai chu-pu hsing-ch'eng kuo-chi hui-tui chung-hsin chi i" ("The Expansion of American Banks in Early 20th Century Shanghai and the Emergence of Shanghai as One of the International Exchange Center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hina's Economic Relationships with Foreign Countries and Its Social Developments from 1840-1949," Wuhan, (May 1988).

以后侵入。所有的这些外资在华银行都得到了本国政府的参与和赞助。美国银行姗姗来迟,而且与其他外国在华银行机构不同,它没有享受任何特殊的支持。1901年,万国宝通银行(International Banking Corporation)由康涅狄格州特许成立,1915年被国民城市银行(National City Bank)兼并,1902年,在上海设立第一个分支机构;在此后的15年里,又在其他一些城市设立了多个分支机构。但是它的业务始终集中在外汇上,对中国的工业,它毫无兴趣。^①

中国自己曾发展出一套极为完善且复杂的金融机构,由山西票号和钱庄组成。1875年到1908年间,山西票号的发展达到顶峰,由于缺少中央银行,它们发挥了政府银行的职能。除去履行西方商业银行的许多职能(或许是它们最早引入汇兑和贴现业务的),山西票号还专门从事省际间的大宗汇兑业务,并为规模较大的钱庄票号提供短期借款。因为它们和帝国政府有密切的联系,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只有三个得以幸存,其余都随之关闭。山西票号的突然倒闭,引起了中国银行系统的货币流通紊乱,但是,随后中国自己的新式银行和外国银行填补了这个空白。

中国土生土长的银行就其渊源来说历史更为悠久。在20世纪早期,钱庄票号以两种形式出现。几乎每个集镇和商业中心都有兑换现金和票据的地方(钱铺)。它们的主要职能在于兑换各种成色的硬币和货币,包括铜钱、银锭、银币、银两、银元和金元,以及在国内流通的本国和外国的票据。它们也吸收存款,向地方商人贷款,并且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前,它们就已经在各自的区域内发行银票。尽管实实在在的生意数量十分可观,但是多数钱庄票号的资本却相当微薄。

① “Banking Institutions in China,” CWR, XXXV (Jan. 30, 1926), 248-49; Harold van B. Cleveland and Thomas F. Huertas, *Citibank, 1812-1970* (Cambridge, MA, 1985); Hao, *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52-54; Frederic E. Lee, *Banking and Finance in China* (Washington, 1926); Lieu, *China's Industries and Finance*; Frank H. H. King, *The History of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4 vols. (1987-1991), 此书是关于这一银行的专门著作,还提供了东亚经济和金融历史的丰富资料,有关我们要讨论的时期,参见:vols. I, *The Hongkong Bank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864-1902*; *On An Even Keel* (1987) and II, *The Hongkong Bank in the Period of Imperialism and War, 1895-1918*。

更具活力也更为重要的就是在大中城市和通商口岸出现的银号。银号主要集中在华中和华南地区,在那里,这些银号称作钱庄,不过,在北方,比如北京和天津,也有货币交易所,在那里称作银行。它们履行了西方商业银行的诸多职能,吸收存款,向规模较大的商号和批发商(包括外国商人)发放短期贷款,发行并贴现商业票据,清算、检验、兑换各种货币。但是,钱庄并不具备发放长期贷款或者发挥投资银行职能的条件。它们多数是独自经营,或者是家族式管理,资金并不是很充足。它们和客户之间的联系主要建立在一种私人关系的基础之上。也正是这种个人关系,常常是其力量所在。

尽管它们的建立并没有政府的特许,也不受规制,但是却因为遵守诚信原则而拥有良好的信誉。^① 1911年以后,钱庄作为进出口贸易中介的地位被取代了。但是在国内贸易融资中,它们依然占有主导地位;即使是在通商口岸,由于外国银行难以渗透进内陆,而中国的新式银行又难以开展无抵押贷款业务,所以,它们依然举足轻重。它们不仅在辛亥革命的动荡后继续生存,1917年以后新式银行大举扩张,也并没有将其排挤出局。相反,它们不断调整,逐渐适应了通商口岸的经济环境,一直都保持繁荣发展的态势,直到国民政府进行货币银行体系的改革,强行剥夺了它们的各种收入来源。一些钱庄还为工业部门融资,从而与中国的新式银行和外国银行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到1933—1938年,钱庄之间的结算业务总额仍是新式银行的4倍多。^②

尽管传统的银行体系较好地满足了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19世

-
- ① 在少数大城市中,特别是上海,这些中国本地银行都有自己的公会,并建立了票据交换所作为公会成员的业务往来服务。
- ② 中国银行业的讨论基于如下著作:G. C. Allen and Audrey Donnithorne, *Western Enterprise in Far Eastern Development: China and Japan* (London, 1954), 105-06; Feuerwerker, *China's Early Industrialization*, 226; T. S. Hsu, "The Native Banks of Shanghai," *Weekly Review of the Far East*, XXV (June 30, 1923), 31-32, 66-68; Baen Elmer Lee, "Modern Banking Reforms in China," (Ph. D.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41); Frederic Lee, *Currency, Banking and Finance in China*, especially 53-57, 69-72; Lieu, *China's Industries and Finance*, 35-83; McElderry, *Shanghai Old-Style Banks*, *passim*; Murphey, *Treaty Ports and China's Modernization*, 58-59; Rawski, *Economic Growth in Prewar China*, 130-32, 142-44; Wa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 482。

纪90年代,以盛宣怀为首的一批官吏和绅商,开始致力于通过建立西式金融机构来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他们对强大的外国银行以现代会计技术为基础的高效率管理体制和运作机制艳羡不已,也希望建立起一套统一的、简单易行的银行体系,并建立一个能够履行中央银行职能的机构,仿照汇丰银行,为大型发展项目提供资金支持。

但是,通过建立中国通商银行(Imperial Bank of China, 1897)、中国银行(Bank of China, 1905)、交通银行(Bank of Communication, 1907)来建立国家银行体系的努力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虽然清政府提供了部分资金,但是这些银行主要还是掌握在个人手里,通常只是为个人或者某个政治派系服务。同时,外国银行还继续掌握着中国铁路建设的绝大多数的贷款业务。曾经有一位观察者嘲讽道,“那些相信‘银行多多益善’的中国人认为,另建个小银行就可以解决一个脆弱的国家银行的问题”。实际上,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由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了中央银行,此前的中国根本就不存在真正的中央银行。

不管怎样,这些机构的建立的确使新式银行得到推广普及。但是总体来讲,1917年之前中国新式银行的发展并不尽如人意。资金不足,管理不善,缺少先进的技术,以及对商界缺乏了解是这些银行的通病。在实践中,传统的金融机构反倒要比这些所谓的“现代机构”表现得更为得心应手。从一开始,这些机构最为典型的特征就是政治化,这一点在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表现得最为明显。这些银行要么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或者它们的代理者实际上所有和控制,要么就依附于后者以及政府高官和军队将领来寻求资金和扶持,甚至是维持生存;作为回报,它们就成为政府贷款的主要来源,以及重要政治人物的捐助者。^①

中外合资企业是西方向中国渗透的另一个产物。大卫·G. 布朗(David G. Brown)对中外合资企业的研究已经证实,中外合资企业由来已久,

① Feuerwerker, *China's Early Industrialization*, 225-241; Ray Ovid Hall, *Chapters & Documents on Chinese National Banking* (Shanghai, 1920); Baen Lee, "Modern Banking Reforms in China," especially 14, 28-30, 62, 101-02; Frederic Lee, *Currency, Banking and Finance*, 72-79; D. K. Lieu, *China's Industries and Finance*; Rawski, *Economic Growth in Prewar China*, 137-38; Wa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 478-96.